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动考察

——政治资源配置的维度

□ 陈文新

[摘要] 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的配置会形成两种基本格局: 累积性不平等和分散性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配置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 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政治资源配置的分散性不平等, 二是 90 年代以后累积性不平等趋势日益明显。当前, 政治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更为合理地配置政治资源, 改变资源配置累积性的趋势, 以避免社会冲突, 构建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

[关键词] 政治资源配置; 累积性不平等; 分散性不平等; 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 D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3) 06-0093-05

[作者简介] 陈文新,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社会阶层不断分化, 阶层矛盾不断凸现。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 本文试图从政治资源配置的视角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演变与发展, 其重点不在于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量化或验证社会各个阶层政治资源配置状况, 而在于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政治资源配置的变迁的考察透视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演变。

一、社会阶层分析的起点: 政治资源配置

从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来看, 主要存在着两种研究传统: 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韦伯的阶层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 阶级阶层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 经济地位具有本原的特征, 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了各个阶级的地位和阶级关系。社会学家韦伯则主张从多元标准: 权力、财富与社会声望来分析社会阶层, 试图从社会群体对权力、财富与社会声望的占有来进行

阶层划分, 社会群体对权力、财富、社会声望的占有是社会阶层形成的基础, 在社会变迁中, 三种主要的社会资源: 权力、财富与社会声望在社会群体间的流动影响社会阶层关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学者在突破传统的阶级阶层分析模式的基础上, 也在不断寻找合适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明晰有力的解释。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社会学家陆学艺的探索, 他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 提出以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 并按照社会群体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 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群体分为五个等级、十大阶层, 每个阶层的位序结构和等级与其对三种资源的占有直接相关。另一位社会学者李强也认为, 社会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 因此, 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1] 因此, 资源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内在规定性, 社会阶层关系的本质是资源的占有关系,

收稿日期: 2013-09-27

本文系 201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谐社会视域下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配置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 10czx013) 的阶段性成果、2012 年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政治资源配置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资源的配置与流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变迁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在社会资源类型中,政治资源越来越受到政治社会学者的关注,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的配置更关乎到社会阶层关系的形成与变迁。从政治资源本身的内涵来讲,政治资源概念比较恰当地涵盖了影响和决定社会阶层地位的基本要素。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对政治资源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角度:一方面从政治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把政治资源界定为“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2]。另一方面,从集体即政治体系的层面认识政治资源,主要集中体现在政治系统论者的研究中。就阶层研究而言,个体意义上的政治资源内涵以及其包含的要素无疑与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相契合,政治资源的内涵基本上涵盖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一系列标准,政治资源可以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政治资源的流动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一个重要观测点,从政治资源配置的视角可以透视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和变化。

政治资源配置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分配格局。在任何社会,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所谓政治资源配置的完全平等只是一种政治理想。多数情况下,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的配置会形成两种基本格局:累积性不平等和分散性不平等。对于政治资源配置的累积性和分散性的不平等,政治学家达尔曾经作过阐释。达尔认为,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累积性的。如果每个人在某个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3]按照达尔的描述,在弥散性不平等的政治系统中,每个群体都能获得一些必要的政治资源;不同的公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资源影响政府官员;人们对政治资源的占有不是完美的,即任何群体不可能完全占有权力、财富、社会声望等主要资源;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总体上,在这种社会中,权力、财富、社会声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分

离的,而累积性不平等相反,社会群体关于政治资源的占有往往会形成资源的叠加效应,人们对某一种资源拥有的越多,会导致对其他资源的进一步占有。现实社会中,没有一种社会类型是纯粹的累积性不平等或弥散性不平等。总体上,在农业社会和传统社会,政治资源往往形成累积和叠加,社会的累积性不平等的特征明显,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虽然工业社会没有完全阻止价值——特别是财产、收入和地位——的积聚,但与传统乡农社会相比,它们还是极大地减少了政治资源的积聚,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将不平等分散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当各种角色缺乏一种政治资源时,就很有把握接近其他政治资源而部分地获得补偿。”^[4]因此,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资源的分配越来越趋向分散,政治不平等将逐渐减少。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政治资源配置的变迁:从分散性不平等到累积性不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资源配置的格局呈高度集中态势。国家垄断了全部的政治资源,采取统一的、集中的模式进行各种资源的配置,在农村和城市分别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体制统摄社会,由此形成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形塑了“整体型的社会聚合体”。^[5]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资源的配置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政治资源的配置出现了分散性不平等的现象,主要体现在:

第一,政治资源的配置开始由集中走向分散,出现从国家向社会流动趋势。随着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国家对政治资源的配置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国家不再是提供社会资源的唯一源泉,国家控制的资源范围逐步缩小,控制的力度逐渐减弱,控制的方式趋向宏观和间接。这样,随着20世纪80年代放权式改革,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政治资源出现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集体到个人三种流动趋向。长期以来以政治权力为本位的资源配置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资源配置体系,社会拥有的政治资源的空间越来越大,政治资源的主体趋向多元化。

第二,由于资源配置的碎片化,社会各个群体都参与到对政治资源的获取中,社会群体获得了一个短期相对平等化的效应。在改革的初期阶段,随着政治资源的不断下沉,政治分层逐渐被击破,市场因素和后天努力对于资源的获取起到了一定作用,社会各个群体都相应地获得了一定的资源,体力劳动者等社会边缘群体首先获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社会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的差距在短时期内缩小,底层群体通过获取一定的教育资源和经济收入的改善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上层精英群体流动。同时,随着政治资源配置的变迁,群体内部高度的一致性的局面也逐渐改变。内部同质性程度很高的工人阶级队伍也逐渐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干部队伍也经历了潮起潮落,原来具有干部身份的企业管理者逐渐从规范的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剥离,原先的四大社会聚合体都发生了分化,原来稳定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新的社会阶层逐渐产生。

第三,社会各个群体虽然拥有的政治资源数量不均,但是都可以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求相应的利益,社会群体之间开始实现了合理的社会流动。这个时期,农村劳动者的子女能够通过有效地利用教育资源,实现从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农民本身也能通过外出务工的机会实现在城市的定居,城乡之间开始出现频繁的社会流动,社会正常的精英生产机制得以构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资源配置分散性不平等的趋势逐渐减弱,累积性不平等趋势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

第一,政治资源的配置出现了从分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的占有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和差距,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逐渐形成。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分散性不平等的短期现象出现了改变,由于客观上各个社会阶层资源获取能力的差异,不同社会成员在收入、社会声望、教育资源等方面获取的差异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不断变得日益明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经济地位高低等级排序中上下滑动。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最高收入群体(私营企业主)与最低收入群体(农业劳动者)的

收入之比高达21.7。^[6]从社会群体收入增长幅度来看,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的是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仅2000—2001年这几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的16倍。而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幅度最小,而且低于平均水平^[7],收入的变化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拉大,199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到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8]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这些“少数人”往往就是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主要指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在另外的一端,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些利益的社会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事实上的政治权利的占有上日益边缘化,逐渐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组成,他们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第二,由于政治资源占有的累积性特征,阶层出现较强的继承性,阶层固化现象开始出现,阶层流动受阻。一方面,强势阶层实现了主要的几种政治资源(权力、声望、财富)的强强联合,并且能够实现资源在阶层内部的传递,阶层的代际继承性也越来越明显,社会上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便是社会阶层分化与定型的动态体现。另一方面,弱势阶层政治资源的缺乏形成了恶性循环,政治资源的贫乏使经济资源更加贫瘠,而经济资源的贫瘠又进一步加深了在政治资源占有上的边缘化,降低了弱势阶层获取政治资源的能力。这样,底层群体子女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减少,农业劳动者成为代际继承性最稳定的阶层,进入中上层阶层的阻力加大,形成贫穷的继承与承袭,“贫二代”现象的流行,说明了底层社会的无奈。过去人们传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政治资源在社会阶层之间的配置“马太效应”使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都形成了各自分离的特有的社会圈子,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遭到限制和堵塞,阶层之间的隔阂不断产生。

在最近的十年中,政治资源配置的累积不平等现

象还在继续蔓延,社会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财富、权力、社会声望、知识等各种资源的组合和集中,使强势阶层的联盟成为可能。更为严重的是,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之中,赢者通吃的现象不断出现,一种“系统性不公”开始形成。^[9]其结果是,强弱社会阶层之间力量严重失衡,精英与大众关系出现持续性紧张,强势阶层对社会的掠夺和底层社会的抗争交织在一起,社会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优化政治资源配置:构建和谐阶层关系

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平等,实现政治平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政治资源相对平等的分配。当前,政治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在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更为合理地配置政治资源,改变资源配置累积性趋势,以避免社会和政治冲突,构建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

第一,准确定位政治资源配置的合理目标。改变目前政治资源配置累积性趋势的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实现政治资源配置的相对分散。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资源配置的分散性是较为理想和相对平等的一种状态,更是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条件。美国政治学家达尔所津津乐道的多元民主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资源配置的分散性,“一个MDP(现代动态多元国家)社会的特征是政治资源的分散,比如金钱、知识、地位以及参加组织;战略地位的分散,尤其是经济的、科学的、教育的以及文化事务;商谈地位的分散,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涉及经济事务、科学、交流、教育以及其他方面。”^[10]资源占有的分散性,使政府每个经济主体都占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以致任何一个统一的集团,包括政府(或者说政府里的一个统一的领导人集团)在内,都不能垄断这些资源”^[11]。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而言,政治资源的分散性配置自然可以改变累积性不平等造成的资源垄断局面,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源,打破目前的阶层固化现象。

第二,保障基础性政治资源的平等分配。政治资源是一个综合的资源体系,从资源类型上可以分为基

础性政治资源和派生性政治资源。前者如投票权、选举权等,这些政治资源基本上由宪法确定和规范;后者往往指公民在这种过程中获得的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机会或际遇,这类资源具有一定的潜在性,往往与个人获取资源的技能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客观上讲,派生性政治资源很难实现完全平等分配,这样,解决资源过于集中、实现相对平等的有效措施是确定基础性政治资源的平等分配。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基本权利上的一致平等,依照宪法,基础性政治资源应人人平等享有,但宪法对这些基本政治资源的规定往往比较抽象,这些基础性政治资源要成为现实往往需要具体的制度和一定的社会条件来保障。例如,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有申诉的权利,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但由于缺乏具体实施条件、自身的政治技能有限,弱势阶层拥有的基础性政治资源往往很难成为现实,其真正拥有的政治资源与强势阶层有很大差异。因此,在现阶段,应从制度安排上真正保障每个公民基础性政治资源的平等分配,从各个环节和方面保障平等实现。

第三,对政治资源的配置要设置上限和下限。由于各种类型政治资源的兼容性和增值作用,尤其是财富作为一种潜在的政治资源,对政治影响很大。为了实现政治资源配置的相对公平,应该对政治资源的分配设置上限和下限,如西方发达国家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免放大财富等对政治过程的效应。对于现阶段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防止强势阶层放大资源配置的累积效应,遏制其把各种潜在的资源例如金钱、社会声望等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力,既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避免强势阶层对政治资源的无限制索取,更要在资本和权力之间建立合理的制度防火墙,构建资本、财富与政治权力合理规范的关系。在政治资源配置的下限方面,要设立对全体公民都适用的资源配置的最低限度,“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12]通过设置政治资源配置的下限,保证所有公民都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政治资源,以实现基本的平等。

第四,积极发挥政府 in 政治资源配置中的职能和作用。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间政治资源配置的失衡

和累积性不平等,表面上看与中国改革路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实际上与政府在政治资源配置中的职能相关。应该看到,在社会利益结构形成过程中,政府既代表了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同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利性。因此,在阶层结构塑造和阶层关系的形成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要矫正和改变政治资源配置的失衡局面,必须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职能发挥的关键是要进行正确的利益定位,应站在公共利益角度和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考虑资源的分配,协调社会阶层关系,不能仅仅代表某一阶层或少数阶层的利益,更不能被强势阶层所“俘获”,应主动适时对市场所奉行的效率原则进行必要的调整与矫正,抑强扶弱,关注底层的政治法律权利,提高社会弱势阶层的经济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政治资源获取上的不利处境。

注释: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

[2][3][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7,96.

[4][美]罗伯特·A.达尔.多头政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9.

[5]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3.

[6][7]李春玲.社会群体的收入差异:两极分化还是多层分化[J].战略与管理,2004(3).

[8]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4(6).

[9]孙立平.守卫底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4.

[10][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348.

[11][美]罗伯特·A.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51.

[1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7.

责任编辑:陈艳华

(上接第86页)

中国农民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充分认可,中国农民市民化在有序、可控、良性互动中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震荡,其实劳资双方都会付出巨大代价,其有关问题的真正解决途径,就是要寻求适当的立法。这种立法,其实是劳资双方经过长期斗争而产生的某种妥协点或磨合点。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的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当一种社会问题出现时,中国应积极而充分地研究西方国家在相应历史阶段的经验教训,研究其走过的弯路、付出的社会代价以及最后的立法成果等;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对自己的现实作充分调研,探寻解决问题的法治建设路子。如此,则中国市民社会建设的有序性程度自然会比较高,其经历的社会阵痛自然可缩短和减轻。

综上所述,农民市民化在西方走过的路,应当成为我们的重要借鉴,但决不应照搬。一些人以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史为据,认为中国也应走类似的自发式斗

争过程,意欲排斥党的领导,这既不符合中国今日的国情,也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7],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的结合,是中国农民市民化实现形式有序性高的政治要素。

注释:

[1][7]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2][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92,292,8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05.

[5]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83.

责任编辑:陈艳华